

第一章

中共西安地方组织建立前的社会状况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西安近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较之京、津、沪、汉等沿海、沿江城市相对滞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组织建立相对较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开始派人到西安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在京、津、沪、汉等地求学的进步青年，追求真理，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西安地方组织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西安社会变化

一、鸦片战争后的西安社会状况

西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她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唐代以后，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近代西安的发展更是远远落后于沿海、沿江城市。但在数千年中华文化凝结成的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下，西安人民在反抗压迫和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西安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个体商贩和小手工业作坊是城市经济运行的主体，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基本没有改变。但是，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和先锋——西方的宗教势力早就窥视着西安。1859年8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龚山林到西安“传教”。西安府根据《中法黄埔条约》的有关规定，将其逮捕后押送广州，使西方传教士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未敢问津西安。1889年11月，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委派医学博士姜感恩、医师罗伯逊和荣安居等人，在西安东木头市街开办了英华医院（1931年更名为广仁医院）。随着西医的传入，帝国主义也把文化侵略的触角伸进了西安。

西安是物阜民勤之地，是历代王朝重要的赋税征收地区之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政府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宣布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西安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西安地区（含今九区四县）总人口已达140万之多^①，正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是，清朝政府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外政策，把对列强巨额赔款的沉重负担，转嫁到人

^① 《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第441页。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民身上。朝廷昏聩 官员腐败 胥吏横行 百姓的实际负担更为沉重。特别在广大农村 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仅田赋附加费一项已占到正常税额的 50% 以上。在鸦片战争期间，西安不仅派出地方军队赴沿海一带前线作战 而且还向朝廷缴纳巨额款项“，这两年京城所需和各军队的饷银 都靠的是山西和陕西两省接济”。清朝政府还在西安开设官钱局 推行当十、当百、当千大钱 盘剥百姓 发行官银票、官钱票 形成银票、钱票充塞 币值猛跌 市面危机 致使西安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几近百万焉”。

1858 年 清朝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订立《通商善后章程》之后 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从此 鸦片大量输入 白银滚滚外流 造成‘银贵钱贱’的状况。按照清朝制度 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为一两当 1000 文，而当时西安的银价涨到了一两当 1600 文以上 其结果使老百姓的苦难加深。他们在出售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时，得到的是铜钱 交纳赋税时 却要折算成白银。这样一进一出 实际上遭受了双重的盘剥。

与此同时，鸦片种植在西安也很快盛行起来。1880 年之后 西安地区已经‘烟苗广植 无地无之’。鸦片市场随着鸦片种植也兴盛起来 进烟馆、抽大烟成为时尚 十分盛行。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确而深刻地意识到鸦片的严重危害性，一针见血地指出 吸食鸦片是“槁人形骸 丧人心志 毁人身家”使“富户日益穷困 少壮变为老弱”。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之下 清朝政府既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

当时使用的货币主要为白银、银元、铜钱，币值与货币的重量密不可分。推行当十、当百、当千的大钱 只是给铜钱铸上当十、当百、当千的字样 就当成原来十个、百个、千个钱来使用 而白银、银币仍然以重量为计算单位。这样就使当十、当百、当千的铜钱币值很不稳定 极易贬值。

性 又非常担心鸦片的危害性 于是采取了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寓禁于征的政策。试图以加重鸦片税收的方法，达到最终禁绝的目的。但是 农民为了应付沉重的税赋 只好以扩大鸦片种植面积来弥补。因此 重税禁烟 不但没有禁止 反而使鸦片种植面积和烟民数量与日俱增 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如处水深火热之中。如果遇到雨涝、干旱和蝗虫等自然灾害 百姓更是苦不堪言 甚至到了鬻儿卖女 流离失所的境地 乡村一片“ 阡陌凋敝 十室九空 ”的惨象。因而 清朝政府不得不在横征暴敛的同时，又不时地对西安地区进行赈济。

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关中大旱 粮价飞涨 饥民流亡 陕西巡抚林则徐命令西安府 将 100 多万石仓粮平价出售给当地百姓 同时利用公共场所收容和救济无家可归的难民以及老弱病残等。 1867 年 西安地区又遇旱灾 西安府在东羊市设立恤嫠局专门办理救济事宜。清朝政府的这些救济 对于广大灾民犹如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灾难深重的西安人民仍然痛苦不堪，反抗压迫的斗争一触即发。

1861 年 10 月 临潼县桥李镇农民杨升华、马将等人为了反对“ 地丁加耗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发动当地群众武装抗击横行乡里的清朝官兵。斗争虽然失败，杨升华全家及 20 多名群众被杀 但对清王朝的西安统治当局震动很大。同治元年(1862 年)4 月 太平天国将领扶王陈德才率部 由商洛、柞水翻越秦岭攻打西安。临潼、高陵等地的回民组织起来 武装抗击地主团练武装 杀死了临潼知县缪树本和陕西团练督办大臣张芾，响应和配合太平军进攻西安。

西安团练头目梅锦堂等人对回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残酷镇压，大肆烧杀长安、咸宁、户县等地的回民村庄及群众 引发了西安、同州(今大荔)凤翔等地的回民暴动 这就是著名的同治年间西安地区回

民大起义。

1862年5月至6月间回民起义军先后攻克高陵县城，杀死知县梁书麟，攻占了西安西郊的金胜寺，击败梅锦堂团练武装数千人。在西安北郊六村堡一带击毙了清军协领图克唐阿、尽先协领讷勒和春等人，消灭清军、团练数千人。1863年7月回民起义军在西安东郊灞桥一带，多次击败钦差大臣多隆阿的军队。10月蓝大顺起义军攻占了周至县城，处死知县安庆麟。1864年2月钦差大臣多隆阿在率兵攻打周至县城时，因被起义军击伤头部不治而丧命。1866年9月西捻军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从商洛越过秦岭进入西安，于12月间在西安东郊十里铺与灞桥之间，击毙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军的湘军提督萧德扬、杨得胜和道员萧德纲等。回民起义军英勇杀敌，顽强作战，与太平军、西捻军互相配合，在西安地区坚持斗争长达六年之久，消灭了大量的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安的黑暗统治，培育了西安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群众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改变自己受苦受难的命运，而且新的灾难还不断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后，带领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逃亡到了西安。西安府为了“恭迎圣驾”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仿照北京皇宫的样式对总都衙门进行改建、扩建，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备行宫，为了保障皇室两宫所需，西安府专门成立了支应局，大肆搜刮民财，曲尽奉迎，极尽奢华，既劳民伤财，又闹得鸡犬不宁。

时逢关中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八百里秦川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皇室，不顾人民的死活，依然穷奢极欲，仅每天的膳食费就需白银200余两。不

到一个月时间，支应局就开销白银多达 29 万余两。到了冬天，市面粮食极度匮乏，小麦从原来的七八块银元一石猛涨到二十七八块银元一石，关中地区的广大百姓啼饥号寒，在死亡线上挣扎。于是，城乡大批饥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西安北院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前，围着军机大臣荣禄，向皇上“要饭吃、要衣穿”。饥民们个个“破衣烂袄，槁形枯面”，一片哀怨乞怜之声，十分凄惨。

慈禧太后在西安期间，为了使八国联军从北京撤兵，不惜将朝廷爱国重臣、支持义和团斗争的兵部尚书赵舒翹以“纵匪肇乱首祸诸臣”罪赐死，西安数千绅民多次向慈禧太后下跪请求赦免也无济于事。而且，她和王公大臣们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大肆卖官鬻爵，借机敛财。“道员再提升为两司，至少须交万金”。陕西城固县的衡张氏和泾阳县的安吴氏两位富孀，也从慈禧太后处用白银买到了“二品夫人”的头衔。

1901 年 8 月，清室两宫回銮北京，把在西安搜罗的金银财物、玉器珠宝、绫罗绸缎、文物古籍等装载了 3000 多辆马车运走，甚至准备将西安碑林博物院的石碑拆下，带回北京。随从太监、兵丁亦借机恣意妄为，强取豪夺，个个“满载而归”。清朝廷腐败无能，“乡民饮血茹苦，久积不能平”，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二、辛亥革命中的西安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同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中国人民艰巨的历史任务。继

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1898年（农历戊戌年）中国的维新派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于6月间发动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变法的目的：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变法维新运动很快被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终身遗恨血洒京城。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在西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97年，长安（今西安）学者阎培棠、毛昌杰、王执中等在西安创办《广通报》，转载外地报刊的时论文章和时间新闻报道，宣传维新。1898年1月，陕西巡抚魏光燾在西安东厅门成长考院创办“既要尊重古籍经典，又要务实创新”的游艺学塾，后并入陕西中学堂。此后，西安相继开办了陕西中学堂、陕西武备学堂、随营武备学堂等。这些学堂“中学”、“西学”兼习，西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由此开始。

1901年11月，陕西巡抚李绍芬在成长考院和崇化书院旧址设立陕西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学堂）；1903年5月，陕西当局将明代创建的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同时在西安组建新军。随后，陕西当局从陕西武备学堂、陕西高等学堂和陕西师范学堂等学堂选派了数十名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农事、矿业、法学等，这是西安派人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开端。

在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变法维新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从事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斗争，其代表人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 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新的阶段。

关中乃至陕西省最早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是蒲城县的井勿幕(原名井泉,字文渊),他早年在四川结识了熊克武等革命志士,1903年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进行志在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井勿幕和陕籍留日学生康宝忠(字心孚)、赵世钰等最先加入。井勿幕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此后,陕籍留日学生中的张凤翔(字翔初)、彭仲翔(彭世安)、张铎(字拜云)、宋向辰(宋元恺)、杨铭源(字西堂)等30余人,在日本学习期间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5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带领张铎等人回陕西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西安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发展王子端(王颀)、焦子静(焦冰)、邹子良(邹炳炎)、李异材(李仲特)、李良材(李桐轩)、王授金(王梦简)等30多人为同盟会员,奠定了中国同盟会在西安建立组织的基础。

1906年夏,井勿幕再次赴日本,遍访留日的陕籍学生,联络其中的同盟会员,于同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同年9月,于右任(字伯循)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长江大都督,并被推选为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协会会长。此后,于右任等陕籍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先后创办了《秦陇》、《夏声》、《关陇》等杂志,寄回西安地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

1905年以后,西安的同盟会员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西安新军中的下级军官钱鼎(字定三)、张伯英、张

钊、党自新、党仲昭、张聚庭、张光奎 等人 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力量 宣传革命思想 商讨革命进行方法。

1908年3月 井勿幕由日本回到西安 在西安开元寺召开同盟会会员大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推选李异材为会长。同时，大会决定联络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和‘刀客’等各方面的力量 共同反清。大会之后 同盟会员们积极开展活动 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聚集力量，从各方面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0年2月 张凤翔、张益谦 字靖清 等 10 余人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钱鼎、张伯英、党自新等 20 余人从陆军保定速成学堂毕业。他们先后回到西安，被分配到西安新军各营任职。

最初新军中只有队官 连长 张作栋、彭仲翔、朱叙五和司务长张聚庭等四名同盟会员 张凤翔、钱鼎等留日士官生和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生到新军中任职后 增强了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力量 也引起了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的注意和敌视。因此，王毓江在新军中大力培植党羽、广布密探 极力排挤、打击和压制留日士官生和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生，给同盟会在新军中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1910年11月 同盟会员彭仲翔、张聚庭等人为了剪除王毓江这个障碍 在新军军官中发动 30 多人联名上书陕西巡抚恩寿，要求查办新军督练公所总办王毓江贪污公款、滥用私人等罪行。恩寿对此不但置之不理 而且还对王毓江百般庇护。彭仲翔、张聚庭等又向北京陆军总部上书控告 同盟会员郭希仁、李良材则利用陕西省咨议局副议长的身份和同盟会在咨议局中的力量，以陕西省咨议局的名义上书北京咨政院控告王毓江。在各方面舆论的作用下，清朝政府遂下令查办，恩寿迫不得已，撤销了王毓江及其新军中的党羽 10 余人的职务。继任新军督练公所总办毛致堂、徐梅生 倾向革命 遂将留

日士官生和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生依次晋升，张凤翔为司令部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营长），钱鼎、张仲仁、党自新、刘伯明、张伯英等调任为队官、排长，使他们掌握了新军中一部分营、队、排的号令权和调遣权。同盟会员又在官兵中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为新军的起义进行积极的准备。

西安起义和秦陇复汉军政府的建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曾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孙中山欲从西北发动武装起义。1910年，井勿幕带着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的密令由上海回到陕西关中，在泾阳柏筱余家花园召集宋向辰、邹子良等10多名同盟会骨干分子进行传达：“言东南各同志以屡年举事失败之由，非但谋划未周，亦因东南交通便利，事机每易败露，欲变方针改从西北着手”。经过20多天的筹划，他们草拟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章程、会员的联络办法、接头暗语等。之后，分别向西安等地的同盟会员进行秘密传达。这时，西安及关中各地的同盟会员已近千人之多，革命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同年农历六月初三，同盟会、哥老会等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代表井勿幕、钱鼎、张云山（字凤冈）、万炳南、张伯英、张聚庭、党自新、马玉贵（字青山）、胡景翼（字笠僧）等30多人，号称西安同盟36弟兄，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歃血为盟，誓为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而共同奋斗，矢志不渝。同时按计划成立了反清斗争的统一组织——“三合会”，为在西安举行武装起义进行了组织和领导力量方面的准备。

1911年夏，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朝政府出卖国家铁路主权的保路运动，同盟会认为革命时机

已经成熟，决定全面发动起义。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的活动十分频繁。新军中流传“农历八月十五举事”之说。西安街头也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说法。清朝官员十分惊恐，不断加强西安城的军事防御，同时将新军和地方军队进行换防，以削弱西安地区的革命力量。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西安同盟会员立即响应。10月17日，同盟会员在得到武昌起义的确信之后，钱鼎、张伯英、张云山、万炳南等人，遂于小雁塔秘密商议，决定于10月29日（星期日）发动西安新军起义。当时，新军的军营中只有训练用的枪、炮，而子弹、炮弹全都保存在城内东县门的军装局里。每逢星期日官兵休假，城外新军方可自由进入城中，这样才有可能夺取弹药。10月21日，新军第二标突然接到开拔宝鸡、凤翔、岐山等地的命令。新军司令部参谋兼第二标第一营管带张凤翔、第一标第三营督队官钱鼎、炮兵营队官党自新、排长张伯英、张仲仁等人紧急秘密商议，决定提前行动，于第二天10月22日（星期日）立即举行起义。

10月22日早上，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哥老会头目张凤翔、张仲仁、钱鼎、张伯英、张聚庭、万炳南、张云山等30余人，聚集在西郊林家坟园里，商议起义的各项事宜。推举张凤翔为首领和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首领，令张聚庭带领数十人暗藏枪支便装入城，控制城内各要地，令党自新、张伯英、朱叙五等，带领数十兵马由南门入城，夺取军装局，令钱鼎、张仲仁等由西门入城，占领陕西陆军中学堂。张凤翔、刘伯明率人马经西门入城，增援军装局，以“午炮”为号，即中午12点报时的炮声一响立即行动。会后各首领立即回到军营准备，分头进行。

中午 12 时之前 各路人马已顺利进入指定位置。当‘午炮’响起时 党自新、张伯英、朱叙五等率部立即冲入军装局。军装局巡防队官兵大部分休假外出 其头目又在省咨议局参加会议 剩下为数不多的士兵猝不及防 便从后门仓皇逃命。起义军顺利地占领军装局 及时地得到了枪支弹药。同时 陕西陆军中学堂、鼓楼等军事要地被钱鼎、张聚庭等率部迅速控制，特别是起义军及时地控制了藩台衙门，使藩库中 70 多万两白银未受损失，为起义成功和以后的军费开支奠定了基础。

起义军占领军装局后 鸣枪庆贺 城内的学生、店员听到革命胜利的消息 纷纷剪掉辫子 臂缠白布条 上街响应起义军。参加起义的新军其他各营队 从西门陆续入城 在军装局领到子弹后分别进占城内的陕西巡抚衙门、陕甘总督衙门、陕西军事参议官衙门等。同时 张凤翔率部进驻军装局 对起义军的行动进行全面指挥。

清军将领文瑞正在省咨议局开会，得知新军起义的消息后匆忙逃回‘满城’ 令士兵紧闭城门固守 并加强各处的防守火力 妄图与起义军对抗。在西安城内的清朝政府官吏得知新军起义，或逃出城外 或躲藏于商民家中 起义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胜利占领了除‘满城’之外的整个西安城。家居‘满城’的前任陕甘总督升允，当日住在西安北郊草滩别墅，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后，连夜渡过渭河 逃往甘肃平凉。

西安城的大部分虽为起义军所占领 但‘满城’这个清王朝在西安的‘小朝廷’还在清军手中。‘满城’是西安城的内城 其北面和东面与西安城墙合为一体 南面和西面的城墙 从钟楼的东北角分别向东、向北 与东、北两面城墙连接 形成一个矩形的城中城 并在西面的新城门（后宰门）、西华门 南面的端履门、大差市开有城门。起义

军首领们商议后决定 钱鼎、万炳南、张云山指挥部队攻打“满城”西面两个城门 张凤翔亲自指挥攻打南面两个城门；调集炮兵配合攻城 并把炮兵阵地修筑在东门和北门的城楼上 居高临下 便于轰击。

10月23日拂晓 起义军对“满城”从南面和西面发起进攻 清军殊死抵抗，战斗颇为激烈。上午9时，清军骑兵从城墙上向两座城楼的炮兵阵地发起反攻，连续三次均被起义军炮火击退。到下午3时，攻城战斗毫无进展，这时，起义军发现南面的一段城墙与别处不同，经勘察确定是房屋的墙壁。于是 起义军将墙壁挖开后冲入“满城”。同时 西面的新城门被起义军攻克 清军的火药库亦被炮火击中 发生剧烈爆炸 清军伤亡极大 乱作一团 失去抵抗能力。这时天色已晚 起义军总司令部命令各部队扼守阵地 等待命令。10月24日 起义军对“满城”进行了全面搜索 发现清将军文瑞投井自杀 遂把俘获的清兵和家属集中在一起 于26日遣送出西安城。

起义军经过一天的激战 攻克“满城” 推翻了清王朝在西安的统治 西安光复。张凤翔、钱鼎、张云山等首领根据武昌起义军的“浙鄂豫复汉军”称号 遂将起义部队命名为秦陇复汉军 刻制了木质“秦陇复汉军总司令图记”的印章。10月23日 起义军在攻打“满城”的同时 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翔”的名义布告安民。郭希仁拟文告示：“各省起义 驱逐满人 上应天命 下顺人心。宗旨正大 第一保民 第二保商 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 一视同仁。特此晓喻 其各放心。”同时印刷由郭希仁等草拟的《大统领檄文》和《告三秦同胞文》等 分发各府州县 说明西安起义的成功和重大意义。

西安起义成功 关中各县闻风而动。同盟会员曹印侯在临潼 杨茹林在蓝田 胡景翼在耀州 岳维峻、郭坚（字方刚）耿直等在蒲城；哥老会成员黄青云在长安 刘松山、牛春山在商州等地 皆聚集当地

豪杰同时并起“，一时泉涌风发 如铜山西崩 洛钟东应 关中 40 余县 数日之间莫不义旗高揭矣”。

10月25日至27日 起义军各将领在军装局举行会议 商讨建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事宜。经过几天的酝酿与协商，共同推举张凤翔为大统领 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 郭希仁任高等顾问 茹欲立任秘书长 彭仲翔任参谋长 张聚庭任教育司长 张云山任兵马大都督 马玉贵任粮饷大都督，张伯英任东路征讨大都督，井勿幕为北路宣抚使，张仲仁为南路宣抚使 同时委任了军政府下设的军政、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外交、司法、交通等八部的部长 从而宣告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

西安光复后 西安巡警学堂学生、同盟会员徐国桢回到潼关 联络当地的哥老会成员在潼关发动武装起义。副大统领钱鼎为了占据潼关要塞 防御清军从东路对秦陇复汉军的进攻 遂率领陆军中学堂的学生军二三十人前往支援，路过渭南时被渭南县民团团长严纪鹏杀害。东路征讨大都督张伯英遂率部赴潼关督战，打响了抗击清军进攻的东路战役。秦陇复汉军与清军在潼关一带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作战，并赴豫西协助河南王天纵部攻击清军。由于中华民国成立 南北和谈告成 东路战役于1912年2月15日结束。

升允从西安逃到平凉后 又从平凉到了兰州 在陕甘总督长庚的全力支持下 充任了陕西巡抚兼军务督办 并征调和招募甘军、回军 40 多个营，分两路进攻陕西。副大统领万炳南、兵马大都督张云山等率部抗击于岐山、凤翔、郿县、武功一带 发动了西路战役。在三个多月的鏖战中 秦陇复汉军数以千计的将士血洒疆场 把升允所部阻挡在乾州、礼泉之间。由于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停战 西路战役遂于1912年3月8日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后的西安政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并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从而结束了 2000 多年来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之后，清朝政府企图通过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和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摆脱全国革命的危机 进而达到镇压同盟会革命的目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 出兵武汉向革命军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 阴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 并不断地谋划着‘取清而代之’和取消南京政府。同时 革命阵营中也有人幻想着说服袁世凯反清。武昌革命军总司令黄兴表示，袁世凯如果能推翻清王朝，“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孙中山也以“满清皇帝下台”为条件 答应推举其为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 在袁世凯的威逼和全国形势的促使下 清朝皇帝宣布退位；3月10日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 袁世凯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 在北京建立了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用高官厚禄收买地方实力派人物，一面发动战争 用武力镇压人民革命 造成了中国‘群雄割据 军阀混战’的局面 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西安同盟会人士认为“推翻满清政权 所志已遂”，兵革可不复用”。他们抱着‘功成身退’的宗旨，有的出国留学，有的‘归隐田亩’；原先从事社会教育的人，依然去办学或执教，有的则以改良社会风气为己任，投身于社会文化事业等，著名的秦腔剧团‘易俗社’就是李

良材、孙仁玉等同盟会员共同创办的。

秦陇复汉军这支辛亥革命的重要武装力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1年11月，武汉临时军政府为其颁发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1912年7月袁世凯则颁发了“陕西都督印”委任张凤翔为陕西“督军兼署民政长”。秦陇复汉军先后改名为“秦省”陆军和陕西陆军。同时袁世凯对陕西陆军极不放心，以统一军事为借口，严令缩编军队，以削弱西安的革命军事力量。加之财政困难，西安当局不得不把裁军作为重大事项进行办理。在裁军中，井勿幕、胡景翼、曹印侯、宋向辰等一些人被迫解甲辞职，其中一些人出国留学。万炳南因对所委任的旅长职位不满，被张凤翔枪杀。秦省陆军的33个标、10多个独立营，被改编为两个师和三个独立旅。整编的结果，使大部分革命人士退出了军队。除陈树藩的独立第六旅还保留了一些同盟会员外，其他各旅中的各级军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洪门帮会成员，军队实权被哥老会的大小头目所把持。

袁世凯又借口统一行政，大批启用旧官僚，借以排斥、分化政府中的革命力量。1912年5月，北京政府中的立宪派和同盟会中的右翼分子，以拥护袁世凯为目的成立了“统一共和党”。张凤翔、郭希仁、宋伯鲁、陈树藩等则在西安成立“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与之呼应，张凤翔对袁世凯的委任亦致电表示感恩和效忠。清朝遗老和立宪派旧官僚乘机钻营，窃据了西安当局政府中的重要职位。

此时同盟会中央领导人宋教仁极力宣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主张通过责任内阁制分散袁世凯的权力，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各地同盟会在此影响下，积极组织政党和筹办地方议会。井勿幕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在西安积极活动，整顿组织、发展会员、筹办议会。后因领导权之争及宗派观念影响，井勿幕在西安

难以立足 被迫出走 西安的革命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不久 在西安的同盟会组织与统一共和党陕西支部合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陕西支部。

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以道员头衔在天津小站为清朝政府训练新建陆军。他以这支军队起家，以出卖维新派而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 并以其北洋大臣和练兵处会办大臣的地位 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成为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三个派系 即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 以冯国璋及其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北洋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 出卖国家主权 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镇压革命 屠杀人民 搜刮民财 割据地盘 独霸一方。他们的恶劣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反抗。

1913年3月 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杀害，“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主张随之破产。为此 孙中山、黄兴揭起反对袁世凯的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以张凤翔为首的西安当局，却领衔通电全国，支持袁世凯，声讨孙中山和黄兴的革命行动。革命党人邹子良、马开臣、吴希真等人则在西安积极响应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 在彬州、乾州一带发动声讨袁世凯、反对西安当局的斗争 被西安当局以“扰乱地方秩序”为名镇压 邹子良、马开臣等在西安被捕遇害 吴希真逃离陕西。陕西陆军第一师第十三团团团长王生岐起兵讨伐袁世凯，亦因遭到西安当局的镇压而失败。王生岐率余部绕道汉中进入河南 加入了白朗领导的起义军。